

目 录

教育先驱 后生楷模

- 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革命家林砺儒先生塑像在信宜中学安放
..... 李卓珊 (1)

- 林砺儒传 苏渭昌 (5)
甘清池传略 陈启著 梁启承 (34)
陈任之传略 陈启著 (36)
信宜优秀的侨务工作者——黄正南 冯廷泉 (40)

中华民国时期信宜籍将级官员简介

- 陈启著 陈坤中 梁启承 (43)
三十年代的信宜现状 杨绍宗 (55)
《黄埔军校同学录》信宜籍学员 梁光沛整理 (64)
信宜最早的飞行员 梁光沛 (73)

一枝四十年代文学之花

- 回忆昆明《文聚》杂志 林 元 (75)
“长春区”革命活动的回忆 黎日荣 (89)
解放战争时期信宜北区的革命斗争 罗琛原等 (97)

- 大洪国时期信宜县知县住在哪里? 陈坤中 (107)
东镇龙、西军之战 赖德荣 (112)

隆世储轶事数则	宁信绪	(113)
林云陔在三十年代前期广东实业建设中的建树	陈启著	陈坤中 (116)
征稿启事		(116)
更正		(147)

本刊顾问: 宁信绪

责任编辑: 李卓珊 楊紹宗

封面设计: 许越峰

封面题字: 罗润原

封面照片: 信城一角

广东省信宜县非营业性出版物

准印证: 信新准字第010号

教育先驱 后生楷模

——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革命家林砺儒先生的塑像在信宜中学安放

李卓珊

当您走进信宜中学校园，步入图书馆阅览室，您会看见在阅览室的顶端中央庄严肃穆地安放着一尊神采奕奕的塑像，那就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革命家林砺儒先生的塑像。

林砺儒先生原名绳直，1889年7月18日（清光绪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诞生于广东省信宜县北界上村。1911年，他二十二岁毕业于高州高郡中学堂后，即考取公费留学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并攻读师范教育专业。学成归国，于1919年，出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一直坚守工作岗位，从事教育工作近六十年之久。

1922年起，林老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主任，立即仿照欧美进行学制改革，将原来小学七年、中学四年改为小学六年，初、高中各三年。1928年，北京师范大学并入



林砺儒塑像

北平大学，改称第一师范学院，林老任临时院务委员会主席。他便着手对学院进行改革，增设社会系，支持师生参加社会的进步活动。他的这些做法不为当局所容忍，1931年被解除职务。

1931年7月，林老应广州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之邀，南下广州任该校教授兼教务长，讲授《师范教育》、《教学法》等课程。次年，即1932年，林老还兼任广州师范学校校长。1933年，林老参加筹办勷勤大学，任该校教务长兼教育学院院长。1937年，勷勤大学教育学院独立为广东省立教育学院（后改为广东省立文理学院），林老继续任院长。

林老一贯坚持真理，在当时极度复杂和困难的局面下善于跟国民党当局作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要求抗日救国的浪潮日益高涨，国民党政府提倡尊孔读经，林老坚决表示反对。林老一贯坚持对学院教学和教育工作锐意革新，坚持真理，提倡学术研究自由，善于广罗学者、专家，开设进步的课程。

1941年10月，林老出任桂林广西教育研究所导师。次年（1942年）4月，他改任桂林师范学院教务长。从1941年到1945年间，林老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怎样做中学校长》、《精神剃须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与国民教育》、《五四运动的评价》、《八·二七路线》、《儿童保育与人性改造》、《养士》等。1944年，他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分析和总结自己多年教学实践经验，写成《教育哲学》讲义。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1月，林老带领桂林师院师生返回桂林，他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与欧阳予倩一起负责广

西民盟的文教工作。1947年8月，林老到厦门大学任教授。

1949年4月，林老秘密赴北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协筹委会，同年9月，他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 会 委员。1954年后，他又历任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同时，他又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1950年～1952年还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1952年，他专任教育部副部长。

新中国成立后，林老非常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1951年，给家乡附近的信宜西江中学赠送了包括二十四史在内的很有价值的图书一大批，约一千多册。他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后，面对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教育事业，忘我地工作。努力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经常到全国各地视察教育工作，先后主持起草了《中学暂行规程》草案和《师范学校暂 行 规 程》草案，并就少年儿童教育、中等教育、民族教育等问题进行一系列调查研究，写下了《中等教育的两个问题》、《了解少年儿童是教育工作的先决条件》、《因材施教，材 也 由 教 成》等重要论文，提出从中国国情实际出发办好教育的好主张。

1961年，年愈古稀的林老患食道癌刚愈，便率领一个工作组奔赴吉林，就师范学校的学制及教学计划等问题进行调查研究。1963年，他连续参加了天津中小学办学经验座谈会和云南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会后又深入云南、广西等地调查研究教育工作问题。在此期间，他还撰写了《师范教育问题随笔》、《语文教师是经师，也是人师》、《怎样对待学校考试》等文章，提出了不少创新的见解。

1977年1月20日。这位“忠诚而勤恳的教育家”，教育

事业的先驱，杰出的爱国民主人士，因患胃癌，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八十八岁。

林老的著作有：《文化教育学》、《伦理学要领》、《教育哲学》、《教育危言》。另有一百多篇论文，散见于各报刊，其中38篇编入《林砺儒教育文选》。

1989年，是林砺儒先生诞辰一百周年。10月23日，纪念我国著名、爱国、进步教育家林砺儒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广州隆重开幕。在开幕式上，中共广东省委常委方苞作了书面发言。华南师大党委书记黄家驹、安徽大学教授麦若鹏、北京师大副教授麻星甫和林砺儒先生长子林颖夫等发了言。出席开幕式的有学者、专家、有关单位代表以及林砺儒先生的亲属等共三百多人。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北京师大，林砺儒先生早年的学生楚图南、钱学森、关山月、廖冰兄等给纪念会送来了题词、信件或书画。楚图南的题词为：“远见卓识教育先驱，言传身教，后生楷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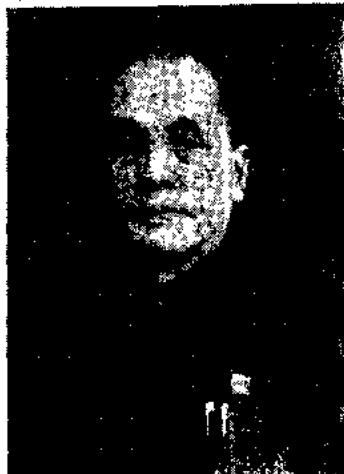
10月25日至26日，纪念林砺儒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在信宜县举行，广东省社科联主席张江明、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王振稼、华南师大党委书记黄家驹等一批专家、学者、林砺儒先生的子女、茂名市副市长黄庆道和信宜县四套班子主要领导同志等60多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和信宜中学师生在信宜中学校园举行了林砺儒先生塑像揭幕典礼。一批专家、学者在会上宣读了学术论文。林砺儒先生的子女林颖夫、林平娣、林安娣自始至终参加了纪念活动，并向信宜县赠送了缩印百纳本二十四史一套。

林砺儒传

苏渭昌

(编者按：邑人林砺儒先生，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本文对林砺儒先生的教育思想，作了颇为全面、透辟的阐述。正如文中所指出的：“学习他的教育思想，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和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有着现实意义。”特予转载。)

林砺儒（1889～1977），广东信宜县人。生于1889年7月18日。幼年丧父，由祖母抚养。童年在私塾读书。1905年（16岁）入广东高州高郡中学堂学习，1911年毕业后公费留学日本，就读于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18年回国。1919年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名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教伦理学和教育课程。在五四运动期间，他支持学生运动，曾帮助学生办平民夜校、识字班等。1922年兼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主任（即校长），首先试行中小学“六三三”学制，他组织教师自订规章制度、教学计划，自编新教材，介绍和推行新学制，成为我国试行“六三三”制最早的倡导者和实行者之一。在1925年五卅惨



林 砺 儒

案中，他著文建议组织援沪工人协会和抵制日货同志会，支持上海罢工工人的正义斗争。1928年，北京师范大学并入北平大学，称第一师范学院，他任临时院务委员会主席。1931年国民党教育部为“整顿”师大，派了新校长，他被解聘，离开北平师范大学，应国立中山大学校长许崇清的邀请，赴广州，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教务长，教师范教育、教学法等课。1932年，兼广东省立广州师范学校校长。1933年，参加广东省立勷勤大学筹办工作，学校成立后任教务长兼教育学院院长，并讲课。1937年，勷勤大学改组，教育学院独立为广东省立教育学院，他任院长。抗战爆发后，他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在学校的地下组织兴办农民夜校，成立战时后方服务队，宣传抗日救国，还亲任战时后方服务队总队长。1938年寒假组织全院师生下乡进行宣传；在校内提倡思想自由，学术研究自由，聘请进步教授张栗原、郭大力等到校讲课，邀请进步人士邹韬奋等到校作形势报告；大胆接受被他校开除而且国民党教育部不许转学的进步学生入校学习。在课程设置方面，他极力主张增添新哲学（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辩证唯物主义等）、经济学、现代经济学说史、国际政治、世界革命史等，宣传革命思想，并购置进步书刊，供师生阅读。国民党当局曾指责教育学院开设新哲学、国际政治等课，他为保留原有的系科课程和进步教师，于1939年将教育学院改名为广东文理学院，将新哲学课改名为教育哲学，仍讲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他拒绝国民党特务插手学院。皖南事变后，搬迁到桂林的江苏教育学院解聘了一些进步教师，开除了一批进步学生。他欢迎这些师生到文理学院来任教和学习。因此，国民党特务视该校为“红色学院”、“小

延安”，竟以停发经费相威胁，林砺儒被迫于1941年5月提出辞职。1941年10月，他到桂林任广西教育研究所导师。1942年4月，任桂林师范学院教授兼教务长。当时国民党特务插手该院，他深为烦恼，在家门口写上一副对联：“读书幸未成君子，学圃犹堪作小人。”还写了许多讽刺杂文，揭露和抨击教育界的黑暗。由于他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国民党特务几次用匿名信恐吓他。1946年，他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国民党特务曾威胁他说：“李公朴的下场就是你的下场。”国民党教育部为进一步控制桂林师范学院，决定将学院迁往南宁，并撤换院长。他再次被迫辞职。1947年8月，他到厦门大学任教授，教西洋教育史、国民教育等课。同时，他积极参加罢教、罢课、罢工斗争，支持学生运动。1949年4月，离开厦门大学，取道香港到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会议和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中等教育司司长。1950年，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至1952年）。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副部长。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以后连续被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0年，患食道癌，经过一定的治疗后，仍坚持工作，深入基层，调查研究。1977年1月19日，病逝北京。终年88岁。^①

林砺儒的著作有：《文化教育学》、《伦理学要领》、《教育哲学》、《教育危言》。他写的论文有百余篇。

^①本文所述林砺儒简历，主要参阅郭培：《林砺儒》（见《民国人物传》第3卷）、《林砺儒大事年表》（见《林砺儒教育文选》附录）。

林砺儒的一生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的一生。自1919年至1949年，他一直在学校任教，在从事学校行政工作期间也讲课，曾被誉为“服务最有恒心的教育家”^②，他也自称“是一个在学校里充数过几十年的老教师”^③。他是一位学识渊博、熟谙中外教育史实的大学者，是一位忠诚而勤恳的教育家。他一生光明磊落，笃实而正直，不计个人名利，不图升官发财，为培养新一代，为创建和发展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

几十年来，他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在教育上有许多真知灼见。学习他的教育思想，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和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有着现实意义。

林砺儒的教育思想，大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论教育本质、作用、任务

自鸦片战争后，先进的中国人士，曾一度视教育为救亡图存的唯一武器。如何认识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把握教育的本质，弄清教育的作用，在半个多世纪里，曾经在思想界、教育界里，激起层层波浪，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前途，成为革命派与改良派、反革命派交锋的一个重要问题。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大论战中，林砺儒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对问题作了独到的分析。

②见《我们的特约撰述》，《教育杂志》第24卷第4号，1934年4月。

③《给教师们贺劳动节》，见1963年4月29日《光明日报》。

他首先肯定教育在陶冶人格、推动社会生长方面的作用。他说：“教育要陶冶健全有用的公民，可以参与政治，可以肆力生产，可以效命疆场，可以从事职业，可以研究学术。”在这里他把教育对政治、生产、国防、学术等诸方面的作用，十分简略地指出来了，言简意明。因此，他认为“民族要不息地生长”，就“不能一时没有教育”^①。他是充分肯定教育的作用的。

但是，他并没有陷入乌托邦的幻想，他认识到“社会力便是教育力，文化生活便是教育环境”，当社会文化整个腐朽，生机将息的时候，“教育的功效，充其量不过是养出一班革命的战士去冲倒旧文化的堡垒，而杀开一条血路罢了”，“若希冀平静地凭教育力量把一个一个人都教好了，而自然而然改良社会”，“那是十八世纪一班教育家乌托邦的幻想。”^②他认为，在这个时候只有藉革命力量打出一条生路，然后教育才有路走。他说：“教育决不可能架空建立一个新社会，也不能任意塑造一些新人物，只能因应着可能的条件，而做一番推动、促成或争取等等间接的功夫。”^③如果社会条件已存在了，教育便应配合这条件下功夫；如果条件还未存在，只能努力去争取，教育也只能配合那争取的运动去工作。

他曾经非常概括而又辩证地论述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进步的政治必产出进步的教育；颓废的政治必不能完成进

^{①②}《中国教育与困难》，见《教育杂志》第26卷第5号，1936年5月10日。

^③《在社会转形期中教育的任务是什么？见《新华月报》第1卷第1期，1949年11月15日。

步的教育。进步的教育可以助成进步的政治，而不能挽救政治的颓废，更不能为颓废的政治作掩饰。”①他说，自从教育成了国家的公共事业以来，某一国某一时期的教育，必然反映着那个国家那个时期的政治，尤其是国民教育，对于政治，真是“如影之随形，响之应声”②。

在二、三十年代，有许多人幻想教育超脱政治，鼓吹超然的教育、清高的教育，他对这种现象的产生曾做了历史的考察和透彻的剖析，他说：“五四运动以后，革命的左翼进步发展而为中国共产党，只剩下温和派的右翼藉文化运动之名而沾沾自喜。适值杜威、罗素先后来华讲学，于是一向失败于政治的改良主义者再退一步回避政治而高谈教育文化，这样便提出所谓新教育运动，其实就是一种没批判地模仿美国教育的运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改良主义者，在辛亥前后，只回避革命而还未回避政治，到了“五四”以后，竟再退一步回避政治而幻想从教育中寻求避难所、安乐窝，于是中国的教育便双重中改良主义的毒素，所谓超然的教育，清高的教育，其本相原来如此。”③

林砺儒清楚地看到在阶级社会里，教育是一种工具。那时有人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反动首领袁世凯也颁发煌煌命令推行义务教育？他认为，这并不能说明提倡义务教育的便不是反动政治，只可以说以反动的政治推行义务教育不能成功。

①②④《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与国民教育》，见《新中华》复刊第1卷第2期，1943年2月。

③《说“新师大”，讼旧教育》，见《新师大》第1期，1950年5月1日。

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并不少见。他说：“历史上枭雄的统治者往往以教育为幌子，只要于他的统治立场有利，他也不惜卖点力气在教育方面做点功夫。”^①他明确指出，谁不明白这点，便是不懂得教育的工具的意义。

建国初期，为了肃清残留在一部分教育工作者中的“教育超然”“教育清高”的思想，使教育工作尽快走上社会主义轨道，为建设新中国服务，在当时情况下，强调教育为政治服务，强调教育要作为革命的武器，是十分必要的，具有历史意义。林砺儒作为一位爱国的进步的教育家，在建国初就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鲜明地提出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是十分难能可贵的。1950年5月，他就说道：“教育为政治服务，是历史的社会的必然事实，倘若不自觉地为进步的政治服务，便不免不自觉地为反动的政治服务，这里断没有中立的余地。”他对政治的理解，也是比较全面的，并没有仅仅理解为阶级斗争。他说：“今天人民的政权下，政治就是最伟大最复杂而丰富的大众共同生活的组织法、管理法。”他还说：“我们为政治服务”，“不是屈服于权力”，“学习政治便是认识自己的工作理想，辨明自己的工作路线”，用“历久弥新的政治理论”来指导教育工作。^②这些见解同后来对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片面的解释是不同的，那时，他认为教育既要加强已经存在的政治条件，又要配合着争取可能存在而还未存在的经济条件，就要把专为广大群众而设的文化教育列为第一位，以充实群众的智慧，而加强他

^①《沈“新师大”，讼旧教育》，见《新师大》第1期，1950年5月1日。

们运用政权的能力，他主张大力发展“专为广大的失学群众而设的成人教育”，他甚至提出“至少今后十年或八年之内，要用全力把这种切合实际的教育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建设的最有效的武器”^②。可见他所理解的教育为政治服务，并不是要教育去单纯地为阶级斗争服务。

二、论师范教育

林砺儒同志是学师范出身的，又长期在师范院校工作，因此对师范教育有特殊的感情和深切的认识。

他对教育问题的考察，有一个特点，就是注意探本溯源。在师范教育问题上，亦是如此。可以说，他对师范教育发展史的考察和论述，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是有开创性意义的。

在他对于师范教育产生原因的多次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大体上是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谈的：

（一）师范教育的产生与欧洲十六世纪宗教革命有直接联系

他说：“师范教育，四百年以前还没有，它是近四百年来在民众争自由争民主的斗争中产生出来的。”他特别谈到了师范教育是宗教革命的产物：“宗教革命以后，民众争取自由平等，争取生活解放，教育家也争取优良的训练，这样，师范教育成为近世新教育之产物。他还详述了新教领袖

^② 《在社会转型期中教育的任务是什么？》，见《新华月报》第1卷第1期，1949年11月15日。

马丁·路德对创建师范教育的贡献。他介绍说，马丁·路德是从事教育工作的，为要打倒旧教会，就要民众读圣经，而当时圣经是用古文写的，民众读不懂，于是就发起国语运动，这样，用国语唤起民众的师范教育与小学教育等等也就从此开始。当时最重要的文献就是路德的《告德国各市长及市参事会书》（1524年）和《告家长为儿童就学义务书》（1530年）。这一方面是义务教育、国民教育最早的文献，一方面也是师范教育文献的最早者。宗教战争闹了二百年，由打武的转到打文的，在学校、在教育上来争民众。从这方面来着手斗争，培养师资，向民众宣传，这就是师范教育的由来。当时旧教也致力于师范教育运动，对师资训练尤其严格，规定：准备充教师的须受初级教育六年，达十六至十八岁，然后两年见习，期满，无过，宣誓愿服务教育，入哲学科学习，廿一至廿三岁，完成学业，得充初级教师，如欲充高级教师，则任初级教师二三年之后，再经考试入大学神学科，受训练四年的得充教师，六年的得充教授。严密训练师资即由这里开始。世界上首次成立正式师资训练所，为一般教育史所承认的是1672年法国里昂神父戴米克创办的一个地方师资训练所，而第一个师范学校是法国旧教领袖沙烈于1685年在兰斯开设的。^①

（二）师范教育的产生与研究新教育有关

林砺儒说：“近世师范教育之勃兴，系新教育研究之结

①《世界师范教育运动史之战斗性》，1946年3月30日在广西省会师范教育运动周的演讲，见《教育危言》。

果，而新教育又系十七、八世纪诸教育名家实地试验之产物。”他认为法国沙烈在兰斯创办教员养成班之原因，在于沙烈所办的平民学校；德国弗兰克在哈雷开办师范院的原因，在于弗兰克所办的教养院。到十八世纪巴泽多在德绍创办泛爱学校，就是泛爱派教育家的养成机关。那时的情况便是如此：开办一所普通学校，教育一班幼少儿童，就由这里发明新教育的理论方法，因时就此培养一班新式教育家。②

(三)师范教育的产生与中学教育内容和性质的变化有关

他说：“原来大学毕业生教中学，这是自古已然的世界惯例，但到了十九世纪开始有了转变，发现大学毕业生教中学不甚妥当了，这是由于中学教育的内容和性质都有了变化”，“中学教育现代化”，“中学师资应由特设的大学来培养，这个建议是早在二百年前一个英国的中学校长提出的”③。他指出，设高师的首先倡议者是十六世纪英国一个著名的中学校长马开斯特（1531—1611），这位中学校长于1581年就发表一篇论文，认为由大学毕业生任中学教师还不够好，建议设师范大学负责培养。这位校长设想建七个学院，训练各种专业人员——语文、数学、哲学、师范、医生、律师及牧师，师范学院的学科包含四类——政治学科、数学、专业陶冶、学科研究及教学法。这就是今天师范学院的

②《附属学校之使命及其与师范本部之联络》，见《师大教育丛刊》第1卷第1期，1930年4月1日。

③《北京师范大学校史拾穗》，见全国政协编《文史资料选辑》第31辑。

最早的胚胎。^①不过，这位校长的这番议论，直至十九世纪始有人响应。于是产生了两种办法：一是在大学内设研究所，把大学毕业生加工训练大约一年以上，才许可充当中学教师；二是专设高师，世界上头一所高师就是巴黎高等师范学校。^②

林砺儒概括了师范教育产生的历史背景：师范教育原是近代世界上教育公众化的产物，因为教育要普及于全民众，所以师范教育就应运而生，“师范教育是平民大众争自由平等之大潮流中为教育家所争出来的”^③。

林砺儒追溯师范教育发展的历史，是为了进一步认清师范教育制度的成绩和问题，以便改进和发展师范教育。他说：“师范教育，也好似民主，它是西欧资产阶级取得统治权时代的产物，遍体都有资产阶级打下的烙印。今天讨论师范教育，必须从这个角度细心诊断，才可以给它医治创伤，矫正歪曲。”^④他认为师范教育发展于十九世纪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是后起的新鲜事物，是为大众教育服务的，因而有进步性，但它是资产阶级政权经手的，就难免偷工减料，所以必然会存在不少问题，要大力改造。他既充分肯定资产阶级创办师范教育的功绩，又不把这一套东西奉为神圣，他有教育家的气魄，敢于在向前进的基础上去超过前人，力求教育体制的不断完善，这种精神是值得学习的。

建国以来，我国教育界对高师怎么办，长期有争论，有

^{①③}《世界师范教育运动史之战斗性》，1946年3月30日在广西省会师范教育运动周的演讲，见《教育危言》。

^{②④}《师范教育问题随笔》，见《教育研究》1979年第4期。